



至順鎮江志

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至順鎮江志

〔元〕

俞希魯編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至 順 鎮 江 志

〔元〕 俞希魯 編纂

楊積慶 賈秀英 蔣文野 竺遠毅 校點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30.625 插頁2 字數561,000

1990年6月第1版

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000冊

ISBN 7—80519—174—3/K·70

責任編輯 薛正興 定價：9.40元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遊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

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100/10

弁言

《至順鎮江志》是僅存的少數元代地方志之一。元刊本久已亡佚。清嘉慶初，阮元得到一部抄本，進呈內府，同時錄存副本，加以校勘整理，由鎮江包良丞出貲梓印。雖經翻刻二次，惜印數不多，到現在全國已所存無幾。

作者俞希魯，鎮江人，是元代「京口四傑」之一，「學問浩博，淹貫群籍」。他編纂的這部志書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獻的散篇佚文，記載了衆多的京口掌故逸事。本志編纂有方，體例嚴謹，阮元譽之爲「敘事精密，甚有法度」，可與元袁桷編纂的《延祐四明志》媲美。

本志在衆多的古方志中，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特點。首先，它很注重社會經濟方面的記載，如當時的土地分配、賦稅徵收、土產貢物等，書中均有詳述。其次，它還記載了基督教徒（也里可溫）和伊斯蘭教徒（回回人）在鎮江的事蹟，以及驅口人數等，反映了元代社會的某些特點，是研究我國宗教

史、民族史的重要資料。對此，外國學者亦極重視，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利用本志來印證《馬可波羅遊記》的真實性。

爲了滿足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需要，並爲廣大地方志工作者提供借鑒材料，中共鎮江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和市志編纂委員會責成我們組織整理這部志書，進行必要的校勘，並加了新式標點，以便利廣大讀者。這次整理，所據底本是鎮江市圖書館藏一九二三年刊印朱、墨二本，並以丹徒陳慶年手錄影抄本對校，改正了一些明顯的訛誤。今後，我們還將繼續有計劃地整理編印鎮江地方文獻，爲建設一個嶄新的歷史文化名城鎮江市，竭盡綿薄。

鎮江市地方志辦公室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前言

鎮江雄峙江南，群山拱衛，一水橫陳，襟吳帶楚，控南拒北，向稱軍事重鎮、歷史名城。建置之始，其來遠矣。春秋名朱方、谷陽，秦始皇發三千赭衣徒鑿京峴，通馳道，因稱丹徒。吳主孫權築京城，形固如甕，故名鐵甕，一稱京口。東晉以還，中原士夫僑寓於此，多置僑郡，故有南徐州、南海、南蘭陵之稱。隋氏一統，始置潤州，唐迄宋初，皆沿此稱。政和三年（公元一一一三年），升潤州爲鎮江府，始具「鎮江」之名。元至元十三年（公元一二七六年），改府爲路，統轄丹徒、丹陽、金壇三縣，明清以來，復增轄溧陽縣，直稱鎮江府。

鎮江歷史悠久，其有文獻可考之方志，在唐即有孫處元《潤州圖經》，亡佚已久。兩宋時期，顯有增多，如山謙之《南徐州記》、劉損《京口記》、熊克《乾道鎮江志》、盧憲《嘉定鎮江志》、趙善湘等《嘉定鎮江續志》、方逢辰等《咸淳鎮江志》，惜多已散佚，今僅存《嘉定志》二十二卷，亦爲後人掇拾整理而成，脫漏頗多。元代志書，祇《至順鎮江志》二十一卷，今亦幸有傳本。故現存宋、元二志（即《嘉定志》與《至順志》），爲今日研究鎮江地方歷史及宋、元兩代典章制度極有價值之文獻。其中《至順志》不僅體制較爲完備，且所載六朝及元代本朝之史料亦較翔實，可補正史之不足，亦可供研究元史之佐證。

此志編纂體例，大致取法於《嘉定鎮江志》（以下簡稱「宋志」），然絕少剽襲痕迹，紀事考證，均較宋志周詳。宋志重於徵存文獻，旁搜博采，務在考核異同。且鎮江於南宋時爲邊鄙之地，故宋志於戰守形勢多所論述。此志則重在考訂故實，特詳於歷代興衰起廢之事。元時天下混一，鎮江轉爲江南財賦之區，故於「田土」「賦稅」之中，官莊民田之產，夏熟秋成之賦，錙銖備載，而「物產」「土貢」門內，則遍引《說文》、《廣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本草圖經》諸書，臚列名狀，詳加細述，此爲古地志中所僅有。其間最可稱道者，乃記有關於基督教徒（也里可溫人）與伊斯蘭教徒（回回人）居鎮江之事蹟，得以知元代基督教及少數兄弟民族流布江南之概況，爲研究我國基督教史、兄弟民族史之具體資料。至於郡守、參佐之任遷，宋志僅收錄自唐以下，而此志遠溯六朝，且詳其官階升降、宦績終始，足補宋志之遺漏。其於元代本朝人物傳記，亦多可補《元史》本傳之缺，如卷十九「人材·仕進·羅璧」條注。此外，尚保存地方珍貴文獻甚多，如其中援引宋劉宰之《尊天敬神文》、《勸念祖睦族文》、《金壇縣靈濟廟增修記》、《重修慈雲寺記》諸文，均不見於劉氏《漫塘集》。再如《潤州類集》、《京口集》之類，世無傳本，亦賴此二志以存厓略，零圭碎璧，尤可珍惜。

關於此志作者，清嘉慶間阮元進奏《四庫未收書目提要》時，尚稱「此書不著撰人姓名」。後吾邑碩儒柳興恩因丁元吉《成化鎮江府志》舊序有云：「勝國俞用中《至順志》例加精密」，乃考證此志爲元俞希魯所修，作者之名始得知於世。近日我們翻閱《金壇縣志》，偶得俞氏所撰《許段橋記》，文中有云：「余嘗忝修郡乘」云云。足證柳氏考訂之確鑿。俞希魯，字用中，永嘉平陽（今溫州市）

人。祖俞卓，宋寶祐中爲廬江令，僑寓京口，因家於此。父德鄰，字宗大，宋咸淳癸酉（公元一二七三年）進士，以文章名於世。元兵破江南，德鄰被劫質軍中，不爲所屈，遂放還，終身隱居不仕，自號「太玉山人」，卒於至元癸巳（公元一二九三年）三月，著有《佩章齋集》十六卷、《輯聞》四卷。弟西發，子四人：庸、麋、希魯、康，志內別有傳。希魯幼承家學，工古文，與邑中青陽翼、謝震、顧觀號稱「京口四傑」。至順元年五月，鎮江錄事司達魯花赤薩都刺職滿歸京，希魯曾作序送行。境內寺碑墓碣文字，亦多出其手。以茂才除慶元路（今寧波市）教授，善啓迪後進，諸生頌之曰：「俞公如洪鐘，叩無不響。」歷任歸安（今浙江吳興縣）縣丞，江山、永康縣令，松江府路同知。卒年九十，著有《竹素鈞玄》二十卷、《聽雨軒集》二十卷。此志纂修當在至順初，俞希魯方爲江山縣尹之時，其刊行則在至順四年夏、秋之間。按志中紀事最晚之時間，爲卷十五「佐貳判官·王傑」條注：「至順四年五月八日至」。據《元史·順帝紀》：「至順四年冬十月戊辰，改元『元統』元年。」故此志之成書，必在四年十月改元之前。劉文淇《校勘記》已有詳考，茲不贅述。

此志元刊本已無從得見，明代以還，藏書之家亦向無著錄。現存刊本，最早爲道光二十二年（公元一八四二年）丹徒包良丞所刻。包本所據，乃揚州阮元家藏鈔本。先是乾隆六十年，宣城張燾以宋元二志寫本贈阮元。嘉慶間，阮氏於進呈內府之前，曾將二志鈔錄二副本：一藏家中文選樓，經歸安嚴元照校錄，一藏焦山書藏，爲烏程張鑑所校，并有丹徒戴守梧箋記，於鈔本之誤已多指摘。道光間，阮元每恨珍籍不能行世，嗟嘆「鎮江人無肯刊之者」。適邑中鹺商包良丞慨然願出貲刊行，以成其父

包祥麟之遺志。阮元遂屬門下士儀徵劉文淇及其子毓松，參合選樓、焦山兩處所藏鈔本及其中校語箋記，考訂體例，勘訛正誤，整理編訂宋志二十二卷、首一卷，元志二十一卷、首一卷，并撰《校勘記》各二卷，分附於二志之後。書成，阮元親爲二志作序，以紀其事。并以手書一聯贈包良丞云：「古籍待刊三十載，舊聞新見一千年。」後跋云：「嘉慶間，余得宋嘉定、元至順《鎮江府志》二部，皆四庫未收之書，曾經進呈，得蒙恩鑒。因以底本貯之焦山書藏，三十餘年，無過而問者。歲辛丑，丹徒包怡莊學兄請付棗梨，鎮江之書歸鎮江人珍護，甚善。不意歸田老眼，尚見此書之成，乃知書之行世及刊書之人遲早，皆有福命焉。因喜而記之。」此志同治二年癸亥（一八六三年）再刻，書後附刻《輿地紀勝》卷七「兩浙西路·鎮江府」全文。一九二三年復有二本：一爲邑人陳慶年墨印本，一爲如皋冒廣生朱印本，乃據包本複刻，似一刻而經朱墨兩印者。其寫本則有影鈔本，張金吾「愛日精廬」本，及阮元所輯《宛委別藏》稿本。

是編即以一九二三年陳、冒二本爲底本，參校同治刊本及陳慶年手錄親點之影鈔本，加以核對標點。包刻二志阮元原序及劉文淇《校勘記》序，原在宋志卷首，現皆置於是編之首。原刊附錄及周中孚跋、陳慶年《讀鈔本〈至順鎮江志〉》（見《橫山鄉人類稿》），均列於書後。唯劉氏《校勘記》二卷，則分列於是編各卷之下，以便檢閱。此外，是編所據底本間有訛誤者，另出案語于該條之後。

標校整理此志，旨在繼承、發揚祖國優秀文化遺產，介紹江蘇古城鎮江，提供地方史料，並借鑑舊志，爲編纂地方新志開闢蹊徑。是編標校，得鎮江師專中文科賈秀英、蔣文野、笪遠毅三同志參加。

并通力協助，歷時半年，始得竣事。其間又承鎮江市地方志辦公室、鎮江市圖書館領導及莊炳輝等同志大力支持，併致謝忱。限於水平，錯謬必多，務請海內方家指正。

楊積慶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序

余家久藏宋嘉定、元至順寫本《鎮江志》二部，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張木青學士燾所贈之書。嘉慶間，曾經進呈內府。又錄兩副本，一藏家中文選樓，一藏焦山書藏，以待有志者刊之，良以二書有關於京口之掌故甚鉅也。京口自東晉以來，屹爲重鎮。流民僑郡，分併改隸，都督開府，參佐從事，寄治版授，建置紛煩，以及宋之差遣，元之掾屬，讀史者憚於鉤稽，往往沿訛襲謬。今詳觀宋志，於六朝僑寄郡縣，縷析條分，於節度、觀察等官罷復，紀之甚詳，其刺守歷任年月於紀傳所不載者，皆稽考得其次序。是故一人之傳，必參酌群書而後定。如「刺史·韋損傳」，以《唐·地理志》「練塘碑」及李華《復練塘頌序》、《招隱大律師碑》參定。「都知兵馬使·張子良」等傳，以新、舊《唐書·李錡傳》、《舊唐書·憲宗紀》、《通鑑》、《太平廣記》參定。此例爲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。至於元《至順志》，本承宋志而作，然絕不剿襲其書。宋志於刺守、宰貳等官，載至嘉定九年止，而元志即

從嘉定十年起，其例尤爲可法。「土產門」引《說文》、《廣雅》、《字林》、《方言》等書，亦地志中所僅見。又二書於晉、宋以來士大夫居宅、墳墓，皆詳其坊巷鄉都所在，其作銘作記之人，亦莫不羅列。雖遺跡久湮，而按籍考之，猶可得其仿佛。後人性好簡略，鮮有及此之詳明者。其餘精當處，亦不勝縷指。二書洵海內之秘籍也。乃問之鎮江人，無肯刊之者，余於《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》中，已慨乎言之。去冬，丹徒包景維良丞介吳陶伯孝廉文鑄來謁，余談次及之，景維因言及其考中憲知有是書，欲刻未果，今願刊布以成先志。余因出家中選樓本，並發焦山書藏本校竣乃還焦山，再加翻閱。選樓本爲歸安嚴久能元照所校，焦山本爲烏程張秋水鑑所校，又丹徒戴桐孫守梧亦有簽記，其中精確者至多。然粗引其端，未意其緒。復屬門下士劉孟瞻文淇暨其子伯山毓松，詳考全書體例及所徵引各書，正其訛誤，作爲《校勘記》四卷，附刻於後。二書俱不著撰人姓名，《書錄解題》有「盧憲《鎮江志》」，宋志中稱憲者四條，因共定《嘉定志》爲盧憲所作，而《至順志》則不知出於誰手？適丹徒柳賓叔孝廉興恩以書來告，謂檢《鎮江府志》成化舊序，知《至順志》爲俞希魯所作。余按俞氏乃元末遺老，爲金華宋濂所推。若非刊刻

此書，烏知俞氏之學精密若是？則刻書洵有功於古人也。是書初刻時，不知書中載包氏名人甚多，乃校勘後知包氏爲丹徒舊族，宋元二志「人物門」，俱以漢大鴻臚包咸爲首，厥後包融、包何、包佶，俱有名於唐代，而元志俞庸《修高資橋記》，亦言「丹徒包氏不墜先業」。中憲名祥麟，字厚村，捐賑施藥，頗多善舉，實爲鴻臚之後。雖此書朽蠹，而班班可考，然則是書之刻於包氏，固天理當而人心安也。刻既成，余故樂爲序之，以爲刻古書者勸。道光二十二年夏至日，揚州預告太子太保、體仁閣大學士、七十九叟阮元序。

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

校刻古書難矣，而展轉傳鈔之書，則校刻尤難。是故宋元槧本及影宋鈔本，皆可據原書付梓，間有訛誤，著於別錄，而不必改易舊文。至于傳鈔之書，脫文錯簡，往往而是，若不刊謬正訛，則其書幾不可讀，亦憾事也。伏讀欽定《四庫全書》，凡從《永樂大典》錄出者，悉經刪衍補脫。《京口耆舊傳》陳升之、許暘、米友仁、邵飾、譚知柔、李琪等傳案語，或引《嘉定鎮江志》，或引《至順鎮江志》。疑二書亦從《大典》中錄出，館臣曾見是書，而未經編定。故有宋志斷爛而以元志補之者，有元志淆訛而以宋志臚入者；有子注而誤爲正文者，有子目而混爲總類者。選樓校本及焦山校本已詳言其誤。今因包君景維刊刻是書，相國阮公命_{文淇}及子毓_崧重加校正，並諭以「不必以研經室提要在前，有所牽就，總期實事求是，不爲鑿空之談」。爰取二書反覆詳校，其有彼此互淆、前後倒置者，悉加釐正，而仍載原文於校刊記，並述其所以改易之故。至《嘉定續志》、《咸淳志》、《永樂志》之

羣人二書者，則另入「附錄」之中，而不加刪削，俾後人得以考見。昔宋彭叔夏作《文苑英華辯證》，其體例大約有三：實屬承訛，在所當改；別有依據，不可妄改；義可兩存，不必遽改。茲編所校，略仿其例，其有以一條而匯舉各條者，亦彭氏之例也。唯是學識謫陋，疏謬猶多，尚望博雅君子，匡其不逮焉。道光壬寅孟夏，儀徵劉文淇識。